



今日世界比较教育丛书

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研究



贵州教育出版社

今日世界比较教育丛书



世界比较教育研究

· · · · ·

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研究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比较教育研究室

贵州教育出版社

000000

12-012

30

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研究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比较教育研究室

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283号)

贵阳黔电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200千字

印数 1—2000册

1991年9月第1版

1992年5月

第1次印刷

ISBN 7—80583—248—X/G·247 定价：3.90元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今日世界比较教育丛书总序》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给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描绘了一幅科学的蓝图；它的公布，标志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改革当然不排斥继承我国的优良传统，以不失中国特色。但教育改革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因而改革也不排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借鉴国外教育发展与改革的经验教训，是保证我国教育改革稳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比较教育研究室为了给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在1983年举行教育科学“六五”规划会议期间，就提出了《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课题；随着改革的深化，又先后提出了《世界职业技术教育》《世界普通教育的改革趋势》《六国学前教育研究》《世界成人教育概述》《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研究》《世界教育思想探略》《世界著名教育家》等八种补充课题，并承担了这些课题的研究任务。《今日世界比较教育丛书》就是这些研究的重大成果

比较教育学是比较学的一门分支，是近代兴起的一种新学科。它和比较文学、比较法学、比较语言学、比较伦理学、比较心理学、比较胚胎学、比较解剖学等一样，都是用比较的方法进行

研究的一门科学。这里所说的比较,是指确定事物异同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即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间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加以对比,从而确定其相同与相异之点,使我们可以对事物作出初步的分类。但只有在对各个事物的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之后,才能把握事物间彼此的内在联系,认识事物的本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说,比较教育学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利用有关的新科学和新技术,研究当前世界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教育;在探索各自的哲学、政治、经济和民族传统特点的基础上,研究教育的某些特点、发展规律及其总的趋势,并进行科学预测,以便根据本国的民族特点、社会制度和其他具体条件,取长补短,充分发挥教育的最佳作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着重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加强智力开发。”我们通过对当今世界教育的比较研究,对于深化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必将有所裨益。

比较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种,就是微观的比较和宏观的比较。微观比较方法的目的在于分析同一的各种事物,通过观察其异同点,探讨它是否合理,是否有价值。而宏观的比较方法则首先是研究事物彼此间的差别,从而深入研究其内在联系。可以说,微观的主要任务在于搜集资料,而宏观则不同,它在比较时必须按照新的标准去思维。就比较教育学研究本身而言,它常用的研究方法也有两类,即以地区研究为主的比较和以问题研究为主的比较;此外,还辅之以历史法、描述法、统计法等等。总之,在研究中要根据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灵活使用各种方法,使比较研究的成果具有普遍的意义。《今日世界比较教育丛书》的编著者,在研究中既运用微观的方法,又采用宏观的方法,同时根据比较教育学研究的自身特点,把地域研究和问题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如《六国高等教育结构》的研究者,选择美、英、法、联邦德国、日、苏等六个有代表性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高等学

校的类型、层次、课程和专业结构等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在占有大量翔实材料的基础上，对这六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从历史到现状，从个别到一般，从类型层次到专业课程的设置，逐一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又在情况介绍的基础上，对六国高等教育作平行比较和影响比较，科学地分析其异同和优劣。最后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和特点，用新的思维、新的标准进行合理的中西比较，从而提出我国高等教育结构改革中可资借鉴，可供参考的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又如《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在介绍美国、苏联、联邦德国、法国、日本和巴基斯坦等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历史、类型结构、管理体制、经费使用和师资培训等情况之后，再作如上的比较，探索对我国职业技术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其他几种研究成果，虽然研究的地区、国别和层次有异，但研究的方法一以贯之。这样，使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更加合理，使这套丛书更具有实用的价值。

比较教育的研究从1817年法国教育家朱利安首次提出“比较教育”以来的一百多年中，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但由于各国的历史状况和教育制度的不同，研究的指导思想也就差异很大，如何解决研究中的“统一标准问题”，还有待大家进一步的探讨。尽管如此，比较总是医治片面、偏见和盲从的一种良方。有比较才能有鉴别，通过鉴别才能识别事物的真伪和价值。《今日世界比较教育丛书》给我们提供了这种良方，这种鉴别手段。它通过对当今世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国家的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以及各主要教育思想流派的分析比较，给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新鲜经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善于学习，我们就可以从中发掘出为我所用的丰富的宝藏来。科学是生产力。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为我们奉献出的这项重大科研成果——《今日世界比较教育丛书》的问世，对于我国各级各类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机构、教育理论战线上

的专家学者、广大教育工作者以及师范院校师生，在深化教育改革的研究和实践，必将起到它应有作用。

方德林

1988 · 3 ·

前 言

高等教育在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正日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它作为学术思想和科学研究的重要策源地，影响着国际知识体系的取向和结构；对于国家发展来说，它作为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和管理干部的重要基地，已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对于教育制度来说，它总是踞踞学校“金字塔”的顶部，通过入学考试、教学内容和毕业生安置等等，制约其它层次的教育发展；对于个人来说，它是提高文化、智力水平和改善经济、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高等教育在（教学、研究、服务等基本职能方面的变化更加加强了它的地位和作用。

与高等教育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这种重要地位相比，与高等教育自身极其复杂的科学内涵相比，对高等教育的研究无疑是显得滞后和不相称了。与对于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研究相比，我们对于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研究更显得失色。近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异军突起，迅速发展，不但在国内形成了堪称“黄金时代”的繁荣，而且在国际上也可以当之无愧地以其规模、活力和贴近实践而引为自豪。然而，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对于同处第三世界的“兄弟”高教体系还知之甚少，进行认真的研究更少。

编辑此书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为较深入地了解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提供若干有典型意义的实例，使我们得以从“具体”的经验中抽象出“一般”的认识；二是为至今还十分薄弱的比较高

等教育研究奠定一点基础，从国际经验的比较中去寻求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教训，更深刻地认识我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过程中曾发生的曲折，避免别国已产生的失误，了解更多可供选择的高教发展策略。

本书首先收入了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研究成果，其用意、第一，是我国作为最大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列在首位，当是题中应有之义，理所当然；第二，以往比较教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缺陷就是忽略了对本国问题的研究，而本国教育的问题和实际需要正是我们研究外国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虽然“洋为中用”并非“对号入座”，也不能“立竿见影”，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只有有了对本国教育实践的真知灼见，才能由此及彼，从比较中找出规律，也才能将外部世界的积极经验根据国情、校情加以改造，恰当地吸收到我们自己的思想和实践中去。

由于我国地处亚洲，又由于我们亟需加强对周边国家的研究，本书以很大比重收入了几个亚洲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个案研究。读者即可从中看到本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历史传统的共同性以及经济发展中充满活力的生机，也可以从中觉察到很多亚洲国家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困境和面临的严重挑战。

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当今世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发展中地区。它们悠久的历史、多彩的文化，它们在政治、经济上与发达国家千丝万缕的联系，都丰富了对它们高等教育进行研究的意义和课题。但是，也许是它们离我们在地理上太遥远，也许是由于相对无知而形成的偏见，我们对于这两个广阔地区的高等教育的研究至今还像是涉足者寥寥的“荒地”，等待着有志者的开垦。书中收入了两位青年学者向这一领域进发的尝试工作，他们不只反映了一种学术探索的勇气，而且反映了脚踏实地、力求详细占有资料的科学精神。关于一个拉美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实例，系由一位中年学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以材料新和观察深而见长。

收入本书的各篇文章，都总结了一个国家富有民族“个性”的独特经验；它们结集在一起，又像多棱镜一样反映了带有很多“共性”的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比如，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起步较晚，历史较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受殖民主义传统的影响较深，有些至今未摆脱殖民主义的阴影；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以西方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进一步加强了西方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学术、文化影响；西方（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有着很广很深的影响；60年代以来，亚、非、拉美第三世界国家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获得了成倍的增长和发展，近些年发展的重点已逐步转向教育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它们从外部协调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从内部进行体制、结构、课程、组织形式的变革，增强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能力，努力发展非正规成人高等教育，体现了多层次、多渠道、多样性、灵活性的特点；改革和革新已成为第三世界高等教育迎接未来国家发展挑战的重要途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也正对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与成绩和进展相对照，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也存在着种种问题和困难，包括教育目标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脱节；数量发展和质量提高的矛盾；文、理、工、农、商、医等科类比例失调；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业和就业不足；专科、本科、研究生层次结构比例失衡；经费削减，财政困难；管理效率较低；人才外流等等。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主办的国际高等教育会议和出版的学术著作已为我们传递了明确的信息：在对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研究方面，我们研究的面还太窄，研究的深度还较浅，研究所需的数据资料还远远不足，研究的方法还有待改进。本书作者在克服这些缺陷、向研究的高度和深度前进的过程中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们相信，站在马克

思主义的思想高度，立足于内容丰富无比的高等教育实践土壤，我国的比较教育工作者一定能在第三世界高等教育研究这个领域独树一帜，作出无愧于民族和时代的贡献。

编者 1991年12月初

目 录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	卫 纯	(1)
印度高等教育的发展及改革趋势·····	马宝兰	(37)
南朝鲜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	商承义	(76)
新加坡高等教育改革与社会发展·····	黄建知	(104)
泰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王一丹	(131)
菲律宾高等教育发展策略的嬗变·····	张国才	(155)
非洲高等教育·····	李建忠	(183)
国家独立与非洲高等教育发展：尼日利亚实例研究·····	蓝 建	(207)
墨西哥高等教育及其现代化问题·····	曾昭耀	(219)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

卫 纯

一、中国高等教育产生和发展简史

中国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奴隶制社会的西周时期就已有了实施高等教育内容的“国学”、“辟雍”、“泮宫”等。那里由官吏兼任教师，是官师合一，能进去受教的只有极少数王公贵族子弟，是一种“学在官府”、作官才能受教的高等教育。到距今的25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开始没落，逐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陈规，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回夷”的局面。儒、墨、道、名、法、兵、阴阳诸家并起，各派各以自己的专长对弟子进行讲学，私学大起，入学的对象扩大了，教学内容丰富了，学术上“百家争鸣”，呈现一片繁荣兴旺景象。诸子百家的著述，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各家兴办的私学，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及其私学，最早的有齐之“稷下馆”等，进行着最高学术水平的讲学，它们为地主阶级子弟乃至少数庶民子弟开辟了受高等教育的道路，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私学是后来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实施高等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到了秦代，焚私学，“以吏为师”，古代

高等教育并未起到为新兴的封建制度服务的作用。汉代吸取秦的教训，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汉武帝时设“太学”，置“博士弟子”50人，则是中国封建社会官立高等学校的发端。

“太学”是当时国家最高官立学府，主管官员先称仆射，后改称祭酒，教授称博士，太学生即博士弟子，由各地选送，以《诗》、《书》、《易》、《礼》、《春秋》、《孝经》、《论语》诸经为共同学习科目。此外，中央设四姓小侯学，地方设国学，也都属于当时的高等教育范畴。到隋代，先设“国子寺”掌管教育事业；后改“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五学，并开始设立自然科学类专科学校。到唐代，“国子监”下除以上五学外，增设“律学”，另有弘文馆、崇贤馆类专科学校，专科教育大发展，学生达8000多人。此时中外文化交流也臻极盛阶段，外国留学生最多时也达8000多人。

隋初开端的科举考试，对中国以后的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影响至为深远。这原是国家选官制度，其实施结果使一般士子读书只为追求功名利禄，学校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

唐代时出现的“书院”，原是藏书修经之所，至五代才渐具有古代高等学校性质，自宋代以后逐渐增多。宋代的一些名师宿儒受当时佛教禅林讲学制的影响，多设“书院”以收徒讲学，教材以经学为主，旁及史书诗文。这些“书院”由“山长”或“洞主”主持，教学特点是注重自学，讲求身心修养，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1130—1200）即是有名的江西白鹿洞书院的主持人，并曾在另一著名的湖南岳麓书院讲学多年。由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和读书法，对后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很有影响。他编纂的《四书集注》也成为这类书院的基本教材。当时比较著名的书院，除上述二所外，还有湖南石鼓书院，河南应天府书院等，它们在培养人才、研究学术和著书立说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小成就。它们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另一重要形式。

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曾在太学”实行“三舍法”，将太学分

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级，由外舍而内舍最后升入上舍的学生，如学行优异，可以直接授官，这样做的目的原为改革科举积弊，但在实际上未取得多少效果，到明清二代，上述书院基本上成为地方官学，科举取士制度仍然左右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经过长期的发生、发展史，形成了以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学的经馆为主要机构的比较完备的体系，其主要任务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经邦济世之才，实即是封建国家政权所需的各级官吏，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培养方式重启发自学和自我修养。它的明显特点是完全操纵于剥削阶级之手，行学术专制主义，思想控制极为严酷。包括在这个体系里的古代专科教育虽然产生较早，但由于以小农为主体的小生产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限制，始终没有受到真正的重视，没有走入正途。正由于此，在唐代一度盛兴的各类古代专科学校，以后便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而由盛复衰，极大地压抑了中国科学和学术的发展。中国古代高等学府的教学愈趋空疏腐化而停滞不前，一直到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有所变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旧中国闭关锁国状态，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少数有识之士产生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与此同时，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工业，主要是军工工业以及与之有关的铁路、电讯、矿业等。在此背景下，以洋务派人士办理的洋务学堂为标志的中国近代高等学校先后创立。第一所是由于“洋务”的需要于1862年创立的京师日文馆，实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第二所是天津中西学堂，它分头、二等两学堂，头等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本科，设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和机械四个“学门”（专业）；二等相当于现在的中学或大学预科。头、二等学习期限各为4年。学生于头等学堂毕业后，“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

1896年在上海开办的南洋公学，设师范院、上院、中院，上院相当于大学本科，学内政、外交、理财。师范院则属于中国最

早的高等师范教育机构。推动和促进国家兴办近代高等学校的是清末的维新运动，中国的第一所由政府举办的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的建校蓝图即是由维新派领袖之一梁启超仿照日本大学体制设计的，由管学大臣孙家鼐负责办校事宜。1898年开办京师大学堂，设《诗》、《书》、《易》、《礼》四堂和《春秋》两堂，同过去的国子监、太学相似。大学堂于次年筹办分科，到1910年分科大学开学，设经学科、文学科、法政科、商科、农科、格致科、工科等七科十三门，除商科外，学制均为4年。

除以上由洋务派人士兴办的学堂外，维新派康有为于1891年在广州办万木草堂，严复于1894年在北京办通艺学堂，梁启超、谭嗣同于1897年在长沙办时务学堂等，它们鼓吹传播维新运动思想，兼讲授经世济民之术，也都属于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

到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前，中国属于国立的高等学校仍只有京师大学堂、天津中西学堂等三、四所，其他各类的数量变化也不大，比之东邻的日本等国家的高等教育显然落后得多。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进程之所以发展迟缓，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经济上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政治上腐败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此时办理高等教育所遵循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封建统治，其思想实质是唯心主义的。因此，它尽管从形式上结束了绵延近二千多年的传统的旧高等教育，建立了新学制，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过去儒家教育垄断一切的局面，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工艺学，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当时社会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是它所发挥的作用仍然很有限。此外，清政府洋务派人士对教育治国的重要性以及对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仍然缺乏清醒深刻的认识，加上当时政局动荡、战事频繁、国事多变等等，也是这个发展进程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高等教育真正进行现代化的改革，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开始的。1912年1月，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蔡元培主持